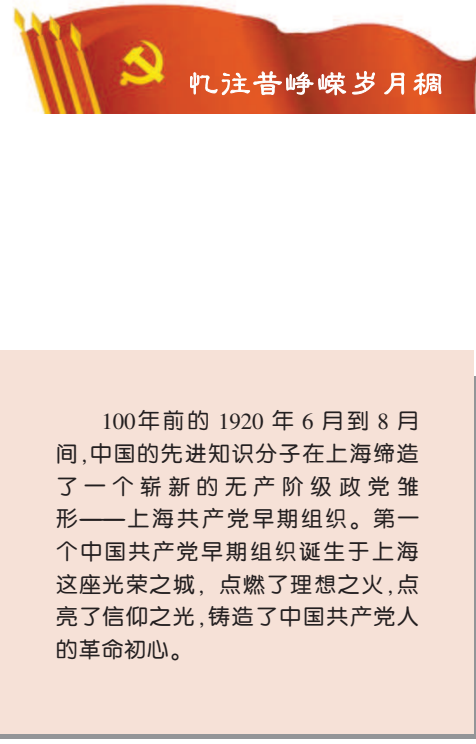




100年前的1920年6月到8月间,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在上海缔造了一个崭新的无产阶级政党雏形——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。第一个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诞生于上海这座光荣之城,点燃了理想之火,点亮了信仰之光,铸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初心。

共产主义知识群体汇集上海

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,对走苏俄道路的认可,促使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研究日益升温,产生了李大钊、陈独秀、杨匏安等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。

1920年2月中旬,为躲避警察的监视,陈独秀由李大钊护送出京。途中两人郑重商定分别在上海、北京建党。2月19日陈独秀来到上海,4月迁入老渔阳里2号(今南昌路100弄2号)寓居。当时,上海有《星期评论》的主笔李汉俊、沈玄庐、戴季陶,《民国日报》主编邵力子等人,几位笔杆子与陈独秀均是新朋旧友,都住在法租界,彼此相距不远,往来密切。

当时,全国有不少青年要求思想解放,他们不约而同到上海寻找出路。参与浙江一师学潮的俞秀松和施存统便是其中的代表,他俩经李大钊的推荐而来。4月,陈望道带着《共产党宣言》的中文译稿来到上海。商务印书馆的沈雁冰、杨贤江追求思想进步,时常拜访陈独秀。一时间法租界的老渔阳里一带,群贤毕至,热闹起来。

5月,俄共(布)远东局海参崴分局代表维经斯基一行来到上海,他与陈独秀等人反复座谈,石库门的天井里时常回旋着论辩声。据陈望道回忆:“越谈越觉得要根本改造社会制度,有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必要,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。”1920年6月间,陈独秀倡议:鉴于当前工人运动急需理论指导,先成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。这和1920年3月,李大钊在北京发起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旗鼓相应,南北两个研究会把经过五四运动锤炼的优秀青年凝聚起来。从研究会转变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,又经历一番周折。在实践中,陈独秀认为“旗帜要鲜明得明”,要学习布尔什维克的作风,建立严密组织。陈独秀创建政党的心情是迫切的,经过充分酝酿和准备,他断定:研究马克思主义已经不是最主要的工作,需要立即组织马克思主义政党。

1920年8月,李达为“寻找同志干社会革命”,从日本回国。他投奔陈独秀,参与筹备建党。8月中旬,老渔阳里2号,在陈独秀的主持下,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宣告成立——这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。首次决议,选举陈独秀为书记,李汉俊起草党纲草案共10条,其中包括“劳工专政、生产合作”等革命纲领。关于组织的名称,陈独秀致函李大钊,经认真斟酌,定名为“中国共产党”。由于它在全国各地早期组织的建立中发挥了推动和指导作用,具有发起组的性质,又被誉称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。

在公共租界的档案卷宗里,也存留了一些相关记载,从中得以窥见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活动的吉光片羽。早在1920年4月,英国在华情报收到报告称,李人杰(汉俊)是两名居住于



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。

上海法租界的“中国的布尔什维克”之一。8月22日,公共租界工部局《警务日报》在“中国情报”一栏中,更是出现长达36行的情报秘闻,“陈独秀,前北京大学教授,现居环龙路。据报道称,陈正于该处安徽籍人士中组织一社团,旨在改进一系列安徽事务并废除现任督军。”这虽然没有破解社团的真实性质,却还原一个重要事实:1920年8月,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。

1920年,共产主义知识群体汇集上海滩,从马克思主义研究宣传上升为建党实践。这些先驱开展了工人运动,构建宣传网络,创建青年团和函约建党的一系列探索。

长衫先生走进工厂

共产主义不是流于理论、止于实践,早期共产主义者脱下长衫,换上短装,“转向工农劳苦人民”。

1920年4月,陈独秀到上海码头工人中了解情况,工人的悲苦现状令他深思。5月1日,上海产业工人举行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集会,集会的口号和宣言,都是在陈独秀的指导下拟定的。当天,他与陈望道、施存统等一起参加庆祝大会。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,《新青年》“劳动节纪念号”专刊也在五一节出版。专刊篇幅猛增至400多页,以一半以上的篇幅,登载上海、北京、天津、唐山等地工人的劳动和生活状况,并附有翔实的统计资料。这一期《新青年》发行数量多达一万份,在全国广为传散。

陈独秀到上海后频繁的活动,也被上海租界当局的密探记录在案。在1920年10月的一份密报中,除了反映陈独秀与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、上海工商友谊会有密切接触外,还分析说:“由于其布尔什维克倾向,如果陈成功地确立起对这些劳工组织的支配地位的话,那么就非常可能会给当局制造很大麻烦。”

上海党早期组织的成员——李启汉和李中,两个年轻的身影出现在沪西小沙渡和沪东江南造船厂。

1920年11月,在安远路62弄(锦绣



《劳动补习学校》(作者:沈金声1959年)



左图:1920年5月1日《新青年》出版的“劳动节纪念号”专刊。右图:上海机器工会临时会所旧址(位于黄浦区自忠路,原西门路泰康里41号)。本版照片由作者提供



里),20多岁的湖南小伙子李启汉在工友们的围观下,将“工人半日学校”的黑字白纸条贴在门上——这是共产党的第一所工人学校。开设有识字班及游艺会,工友们有了学习和休闲的好去处。关于“工人为啥苦”“资本家怎么剥削我们”,工友出神地听着“大道理”,却又很无奈地说:“工人不出头,出头便入土。”李启汉启发工友:“工人两个字合起来,就是一个‘天’字,我们工人要做天下的主人!”因为方法接地气,工人学校发展迅速,建立了工人党组织,积极分子孙良慧等成为第一批青年团团员。

1920年8月初,李声解改名李中,受早期党组织委托,进入海军造船所(即后来的江南造船厂)做锻工。他广结工友,发动组织机器工会。11月21日,上海机器工会在白克路(今凤阳路)上海公学召开成立大会。当天有近千人参加,孙中山、陈独秀一起“同框”出席大会,这是非常稀见的。在演说中,陈独秀对机器工会寄予厚望,肯定了工人阶级作为社会“台柱子”的重要地位。

上海机器工会创办英文义务夜校,每晚教课2小时,不收学费,深受工人欢迎。从发起到成立,短短两个月,已有会员370多人,初受教育的工人,还能在《机器工人》上发表文章。上海机器工会的建立,引起了国外工会组织的关注。世界工人联合会执行部总干事罗卜朗(Roy Brown)发来贺电:“听到你们竭力组织和教育工人,我们希望你们的成功,而且表示国际上的同情。”中国劳动界第一次和外国劳动界有了联络。

“三刊一社”宣传网络

1920—1921年,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构建了“三刊”(《新青年》《劳动界》《共产党》)“一社”(社会主义研究社)的马克思主义宣传网络。

陈独秀将经营了5年的杂志《新青年》改组,吸收陈望道、李达、李汉俊、沈雁冰、袁振英等加入编辑部。1920年9月,《新青年》第8卷第1号高擎马克思主义旗帜,由新文化运动的先锋,转型成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联系知识分子、自由主义者胡适不由大惊,说《新青年》“色彩过于鲜明”。8月15日,第一个工人刊物《劳动界》周刊创刊,李汉俊担任主编。发刊词中阐明,办这个

报是“要教我们中国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”。该刊语言通俗易懂,是发刊最早,出版时间最长、影响最大的工人读物。随后,上海又创办了《上海伙友》《机器工人》《友世画报》等工人刊物。

11月7日,党刊《共产党》创刊,李达任主编。第一次在中国大地上打出“共产党”的旗帜,肇始出刊便石破天惊。刊物专门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各国共产党的实践,在分辨无政府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时,《共产党》表现出深刻的批判精神。为了避开搜查,撰稿者都不署真名。通过寄送的方式,在全国秘密发行,成为各地党员的必读材料之一。青年毛泽东在收到《共产党》月刊后,一面组织长沙党组织成员学习,一面向进步学生散发。1921年1月21日,毛泽东给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信中,赞誉《共产党》不愧“旗帜鲜明”。蔡和森在《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(提纲)》中指出:“党的出版物,除《新青年》外还有《共产党》,销数很广,宣传亦很有力量。”

鉴于出版工作的极端重要性,由维经斯基提供经费,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创办了党的第一个出版机构社会主义研究社,在辣斐德路(今复兴中路)成裕里租赁房子,建立又新印刷所。1920年8月,该社出版了陈望道翻译的《共产党宣言》,这是中国最早的中文全译本。首版很快售罄,9月又出了第二版。到1926年5月,《共产党宣言》中译本已重印到17版,其再版速度远超同时代其他任何一本图书。

随着租界文化政策的收紧,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刊物也屡遭破坏。1921年初,《新青年》第8卷第6号“排印将完的时候,所有稿件尽被辣手抓去”,法租界以“过激”为由,不准《新青年》在上海印刷。于是,从第8卷第6号起,《新青年》改在广州出版。1921年初春,《共产党》月刊正排出第3期,突遭租界密探查封。

尽管困难重重,但这些进步书籍已在中华大地点燃熊熊之火。毛泽东等人深受影响,1936年在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,他说:“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刻在我的心中,建立起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。”“即其在1920—1921年读到的《共产党宣言》《阶级斗争》《社会主义》。这些书刊不仅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,而且为以后的革命

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。

老渔阳里的星星之火

在筹备建党期间,陈独秀提议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,作为中共的后备军。1920年8月22日,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,俞秀松担任书记,团的中央机关设在新渔阳里6号(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)。如此,老渔阳里2号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所在地,新渔阳里6号是社会主义青年团所在地。团机关还创办了外国语学社,这是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党校和团校,选派了刘少奇、罗亦农等一批优秀团员赴苏联学习。

俞秀松撰写了青年团章程,建议各地建团。此后,北京、武汉、长沙、广州、天津等地陆续建立了团组织,全国团员发展到1000多人。在此基础上,1921年4月,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执委会。由于上海青年团组织的发起与指导作用,团的临时章程规定“正式中央机关未组成时,以上海机关代理中央职权”。当时,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是秘密的,青年团是半公开组织。大家称党为本校,称团为预科,党的许多活动以团的名义开展。在团和党的关系上,团接受党的领导,这也奠定了青年团紧跟共产党,成为党的忠实助手的良好基础。

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通过写信联系、派人指导或具体组织等方式,紧锣密鼓地推动各地共产党组织的建立。1920年11月,李大钊正式成立“共产党北京支部”并亲自担任书记。1920年5月,青年毛泽东来到上海,寓居哈同路民厚南里29号(今安义路63号)近两个月。其间,他多次前往老渔阳里2号,与陈独秀一起探讨理想与主义。由此,他回忆,“1920年夏,我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,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了”。回到长沙后,毛泽东于1920年冬组建了湖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。武汉的早期组织是李汉俊从上海来同董必武等商议,陈独秀又派刘伯垂到武汉建立起来的,取名“共产党武汉支部”。1920年12月,陈独秀南下广州后,同谭平山、陈公博、谭植堂等建立“广州共产党”。此外,李大钊派遣陈为人到济南同王尽美、邓恩锐联系,建立山东党组织。陈独秀还以通信形式,推动旅法的张申府、蔡和森等人建党。

据考证,1920年8月到1921年7月间,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有15人,即陈独秀、李汉俊、沈玄庐、陈望道、俞秀松、杨明斋、李达、袁振英、邵力子、李季、林伯渠、沈雁冰、李启汉、李中、沈泽民。此外,还有曾经在上海参加党组织、后去武汉的刘伯垂;留学法国的陈公培、赵世炎;留学日本的施存统、周佛海等。上海小组成员中年龄最大的陈独秀41岁,最小的沈泽民只有19岁,平均年龄在30岁以下。以李大钊、陈独秀等为代表,他们勇立时代潮头,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,转型为中国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。

1920年,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,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思想层面推进到实践层面,这是一次质的飞跃。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活动开创了若干第一,担纲了“发起组”“中央局”的作用,为中共一大的成功召开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。

100年后,我们回望这段历史时,更加清晰地理解了“为中国人民谋幸福,为中华民族谋复兴”的初心和使命,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历史与时代的担当。

中国共产党发起组
成立100周年纪念专题



解
秋
日
报

消费
市场

专版

刊登内容

金银首饰 百货卖场 休闲旅游
儿童用品 食品餐饮 建材装潢
体育健美 超市促销 家具厨卫
家用电器 婚纱摄影 品牌人物
酒类饮品 医药保健 教育出版

电话: 021-22898598

风
雨
琳
琅

陈
新
华
著

林徽因
和她的时代

无人问津的后院

成长的岁月也不尽是欢笑。如同童年院落里的那一片阳光,在无数的日子里带给她温暖,却也是她一生中最孤单的记忆。

孤单源于身世和时代。

站在旧与新、传统与现代交替的时代的夹缝之中,林家大宅中的气息渐趋开明,也是过渡的味道——调和的努力难免会留下冲突的痕迹,投放在林徽因个人的世界中,就成为阳光下的阴影,持久地追随她。林徽因一生,很少谈论自己的童年。然而,源于时代与身世的阴影,如何能躲得过?

父母的婚姻是为了维系林家香火的旧式结合,这给了林徽因庶出的尴尬地位。而以妾的身份被娶到林家的林徽因的母亲何雪媛,出身小作坊主家庭,像那个时代大部分的小家碧玉一样,不通文墨,不谙诗词,不擅女红,不懂持家。殷实家境里老么的排行,又造成了她的任性执拗。这样一个脾气急躁、任性骄纵的女子,进入书香门楣,她的命运已是可以预见的了然,她也果然没有能够创造出反转的剧情;在林家大宅中,她空有一副端正的容貌,既难得到丈夫的爱情,也讨不来身为名门闺秀的婆婆的欢心。总算等到林徽因的出生,人生看似有了转机,但这转机还未及细细品味,就已从掌心流走。

林徽因出生以后,何雪媛又连续生了一男一女,这两个孩子却相继夭折。从此,她便时刻笼罩在无法传延香火的惘惘的威胁当中。挨到1912年,林徽因8岁时,经林长民的福建老乡李孟鲁介绍,林长民终于娶了第三位夫人——程桂林。对于何雪媛,提心吊胆的日子到这里算是到了头,取而代之的,却是更难熬的绝望。

被林徽因唤作二娘的程桂林是上海人,在一个以福建人为主的大宅中,或许她和何雪媛唯一的共同之处便是系出江南。然而,此江南非彼江南。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和浙江嘉兴的小城,无论是眼界还是历练,都不可同日而语。成长于上海风情中的程桂林,人既美,又乖巧伶俐,虽也只是略识文字,却很快得到全家人的欢心。林长民对她宠爱之至,甚至自称“桂林一枝室主人”。人世间的,有时就是这样,顺理成章得令人全没办法可想。

同在一个屋檐底下,眼看着何雪媛落入“冷宫”,人生从此不可救药地坏下去,集万千宠爱的程桂林却是锦上添花。嫁入林家的程桂林先生一女,夭亡,紧接着生下4个儿子:林桓、林恒、林喧、林垣。

何雪媛婚后的生活就这样被岁月逐渐拉伸为无边的寂寞和幽怨。杭州的家随着林长民搬了又迁,而无论在上海、天津还是北京,幸福对于她都一样既不可望更不可即。她只能永远地守着自己不变的哀怨。

藏在清冷的后院向自己倾诉。在这样的的心境底下,注意到后院的那一片阳光并为之深深吸引的孩子的存在,除了异乎寻常的艺术感受,更多的,恐怕还是对一个安稳而和暖的现世的强烈向往。

1937年,已是而立之年且为人母的林徽因写就了短篇小说《绣绣》,讲述一对遭丈夫、父亲遗弃的母女的悲惨际遇。阔绰人家出生的绣绣,乖巧善良,原本应该有一段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,不幸的是,母亲生了五六个子女,却都中途夭折。父亲新娶了姨娘,从此对母亲不闻不问。失去丈夫欢心的绣绣的母亲,在日复一日的怨恨中日渐暴躁。绣绣成日挣扎在父母无休止的吵闹中,左右为难,处境堪怜,终于在病痛中离开人世。

这一篇虚构的小说中,角色的设定,从生过几个孩子,只留下一个女儿,其余尽数夭折,性格日益孤僻傲慢的母亲,到另娶他人,对母亲漠不关心的父亲,乃至孤单的小女孩绣绣,处处可见林徽因童年生活的影子。小说中,林徽因借绣绣之口,表达了自己的困惑和伤痛。

我知道绣绣私下曾希望又希望着她爹去看她们,每次结果都是出了她孩子打算以外的不圆满。这使她很痛苦。这一次她忍耐不住了,她大胆地埋怨起她的妈:“妈妈,都是你这样子闹,所以爹才走了,赶明儿他再也不来了!”其实绣绣心里同时也在痛苦着埋怨她爹。她有一次就轻声地告诉我:“爹爹也太狠心了,妈虽然很有脾气,她实在很苦的,她是有病。你知道她生过六个孩子,只剩我一个女的,从前,她常常一个人在夜里哭她死掉的孩子,日中老是做计,样子现在很两样,脾气也是很好的。”

这段场景,写出了绣绣的为难,也写出了自己的为难。

(四) 连 载